



五十春秋一颗心(下)

北京 53年届 陈浩凯

主要摄影作品《争先》、《中流砥柱》等，发表于《体育报》等报刊。事迹被收入《中国摄影家大辞典》等。

获奖记录

1979年被评为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。

当我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坤甸埠读完初中时，父亲要我就业从商，不再继续提供我生活和学习的费用，而我则硬着头皮毅然走上继续念高中的道路。同学们鼓励我，并为我在雅加达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一份工作，我下定决心，满心欢喜和同学们一道踏上新的征途。

到了雅加达，考上了全印尼著名华校巴城中学，每天上午学习，下午同学们课外活动，我则打工，晚上复习功课；日复一日，半年下来，有些疲惫不堪，虽说学习成绩不错，但一个子儿也没挣着。老板解释说：“你是学徒工，没收你的学费就够照顾的了！”第二学期我不打工了。我父亲看我学习的决心很大，且成绩不错，他说“念你一足之伤”，答应供我继续上学的费用。这样，我总算能有和同学一样的就学机会。

1951年初，新中国成立一年多，长期历

经战争磨难的祖国，百废待举。海外青年学子满腔热血，一心向往祖国，渴望投身祖国经济建设。一时间，“回国升学”成了当时的热潮和时尚，成百上千学生组成回国学习团，涌向亲爱祖国的大地。我同许多同学一样，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，毅然登上回国的万吨巨轮北上。第二次升学的抉择，我义无反顾直奔祖国首都北京，考上了北京育英中学，享受助学金。

1952年入团，1953年入党，同年考上全国著名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，全年级只我一个候补党员，义不容辞地要承担各种政治工作任务。团支部书记、党支部书记、政治辅导员各种“头衔”加到我的头上，成了清华大学特产——“双肩挑干部”（边学习边工作）。6年下来，经过建筑学专业训练，毕业了，照常规应是从事建筑设计或教学科研工作，这也是我多年祈盼报效祖国的工作。

这次不是我自己下决心选择了，而是“工作选择了我”！留校工作第二年，被调去搞宣传工作，学摄影，写文章，编画册等，干了好几

年，一直到“文革”。后来到江西鲤鱼洲的农场劳动，“接受再教育”三年。回校又当了音乐室主任，兼任建筑系的美术课和摄影课教师……可以说是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。

1984年我被派到烟台市新成立的烟台大学参加创业，担任烟台大学建筑系副主任。这是大学毕业以来真正回到老本行，从事建筑专业的管理与教学工作。

烟台是沿海改革开放的中等城市，中等教育很普及，水平较高，却没有高等学校。这里空气新鲜湿润，蓝天碧水，风景宜人；农业发达，盛产水果海产。我来到烟台，就仿佛回到了海外故乡坤甸一样亲切。

烟台大学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口支援，委派教授担任各系主任、副主任，许多主要课程由两校派教师授课，由两校办研究生班代培烟大的后备师资力量，如同两校合办的“分校”，因此发展迅速，成绩显著。

我们这些由北大、清华借调来的各系负责人，绝大部分都不带家眷，除了寒暑假回京外，常年在烟大，全身心扑在艰苦创业上，被昵称为“快乐的单身汉”

。创业初期，师资短缺，建筑系尤甚。由于建筑学人才在社会上很吃香，搞建筑设计比搞教学收入高得多，要想从全国重点大学和社会招聘教师，太难了。只能从东北、西北两方面物色人才。我千方百计从师兄姐妹中动员。

1985年，有了七、八名教师，校舍建起来了就开张。建筑系只招一个班，30来个学生。我除了系主任工作，还兼任烟台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，参加美术课、建筑设计和西方建筑史的授课与辅导。其次，新建校的专业图书、资料匮乏，特别是建筑学专业书。一方面从清华收罗多余的旧图书，接受无偿捐赠，另一方面集中有限资金购置最新国内外专业图书资料。艰苦奋斗了5个春秋，第一届本科生毕业了，为山东省培养出第一批建筑专业人才，第一次享受到辛勤耕耘后丰收的喜悦。

这第一

批毕业生很快成了建筑设计行业的骨干，有的还成了各级专业领导骨干。如今的烟台大学，经历了整整20年的艰苦奋斗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省重点大学。现在建筑学专业本科生400多名，教职工46名，现任系主任就是烟台大学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郝曙光。看到了这些成绩，怎能不教人感到欢欣鼓舞呢！

1990年，清华、北大支援人员全撤回本校，我回到清华被任命为建筑学院的《世界建筑》杂志社社长兼编辑直到退休。退休后，操起老年业余合唱团的指挥棒，人们戏称我是“合唱指挥专业户”。晚年能为老年朋友服务，“不亦乐乎”。



1951年回国前夕摄于雅加达